

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几点思考

格 勒

[摘要]中国人类学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今人类发展和中国发展的新形势,呼唤中国人类学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这既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中国社会现实变革的实践需要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微妙变化的必然要求。重要的是中国人类学研究为现实服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根本特色。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现实服务;应用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2) 04—0001—05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 2011 年民族学博士点一级学科建设项目(2011XWD—B03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格勒(1950—),男,藏族,四川甘孜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藏学、人类学。北京 100101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类学才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回顾改革开放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即极“左”思潮的冲击,人类学在中国被视作资产阶级学科受到遏制,原有的人类学先后被撤销了,“文化人类学”一词被禁用,甚至成为禁区,从此这门流行西方上百年的学科在中国停顿了近三十年。中国的人类学只保留了民族学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研究范围极为有限,不少人类学专家不是改行就是受到批判。直到 80 年代初恢复高考制度,当我要报考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时,还有人对我讲,人类学是殖民主义者的工具,达尔文是资产阶级学者,不值得学习等等。就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想和两个“凡是”仍有影响的艰难条件下,我的导师梁钊韬教授不顾年老体弱,不顾理论领域的各种旧框框的束缚,经过多年的奋力筹划,于 1981 年终于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即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确立了人类学专业在新中国大专院校中的公开地位,我也因第一个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而获得“新中国培养的一个人人类学博士”的殊荣。从那时到现在,时间过了 30 年,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地位日益提高,人类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明

显。与此同时,一些大学中的民族学系开始改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系或民族学和人类学学院,社会学系改为社会人类学系,一些科研单位的民族研究所改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各种以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为名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也相继建立,各种人类学的西方名著得以翻译和出版,喜欢阅读人类学著作和报考人类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学生越来越多。更令人激动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干部要“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有关民族问题的知识。”^[1]人类学得到了党中央核心领导集体的肯定和认可。我相信中央如此重视人类学的学习,是因为人类学在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大有可为。这就要求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必须在为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服务方面下大功夫、下大力气。尤其是 2011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重大决定,明确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2]。人类学作为“研究文化的特殊科学”^{[3] (P. 2)},作为以探索人类及文化未来发展为基础理念的文化人类学,

“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人类学工作者如何才能不负众望,通过扎实的研究‘从实求知’,对现实提出真问题并给予这些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的解释?这必然是中国人类学家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3] (P. 12)}我国各民族在未来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过程中如何做出我们人类学的特殊贡献?这是中国人类学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我认为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好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定并为此做出理论贡献,唯有将西方人类学中国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人类学研究,用敏锐的眼光关注、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跟踪研究国内外正在发生的各种社会文化的微妙变化,才能借此机会推进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大发展和大繁荣,从而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这就要求中国人类学研究必须学习前辈的优良传统,坚持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一、人类学自身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

中国人类学研究为现实服务是人类学自身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回顾西方人类学的百年发展史,从研究对象来看,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1)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40年代前,以研究无文字民族(原始社会或简单社会文化)为主,这个阶段“人们称人类学为研究‘野蛮人’和‘原始人’的学科”^{[4] (P. 73)};(2)从二战开始,美英人类学家开始研究日本和德国等国的国民性,从而开辟了人类学新的研究领域——对文明民族的社会文化研究,形成研究无文字民族和文明民族并存的阶段;(3)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展到工业社会中的都市,并形成人类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都市人类学;(4)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人类学家的研究开始由异民族(非西方)为主转向本土民族的社会文化为主。人类学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在欧、美、澳及亚洲各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仅在大学里设立了人类学专业系、科,还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大量应用于解决生产和社会问题,并与有些应用学科结合,产生了应用人类学的许多分支学科。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以后,世界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缩小了的社会。工业化、商品化、都市化以及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设备,已将世界各地不同种

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社会群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代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使传统古老的社会渐渐从世界各地消失,尤其是信息时代,人类社会被都市化、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浪潮层层包围,人类学家的研究领域也不得不从古老的部落社会转移到现代社会或发展到对都市社会的研究。如果说“长期以来,主流人类学的主要旨趣都是纯学术的理论研究,而不是应用工作”^{[5] (P. 404)},那么,如今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不得不从纯粹的描述、解释,发展到今日的理论和应用并举,人类学不得不面对风雨多变的国际和国内正在发生的社会大变革。特别是针对当今世界困扰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环境污染、人口压力、文明冲突、恐怖袭击、网络袭击等各种重大问题,文化人类学中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了农业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经济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传播人类学等一系列与当代社会生活问题密切相关的分支学科,最终出现了直接为现实服务的“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或“应用民族学”(Applied Ethnology)或“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从此人类学走出了学院的“象牙塔”,“他们密切关注学科内外的社会事物和社会问题,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与合作,使人类社会更多的人因人类学而受益”^{[5] (P. 404)},人类学自身的地位也由此得到提高。

福斯特(G. Foster)是西方著名的应用人类学家。他在《应用人类学》一书中说:应用人类学的“基本目的在改变人们的行为,并相信可改善当代的社会、经济及科技问题。”^{[6] (P. 5-6)}近30年,随着中国社会加快工业化、现代化、都市化的进度,中国的社会文化也正在经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用费老的话说就是“中国经过20世纪的‘三级两跳’进入了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3] (P. 2)}在这样一个时代,面对攸关国家兴衰的大是大非,中国人类学怎么能漠然置之、视而不见呢?急剧变动的中国社会现实,已经不允许我们哗众取宠地空谈,更不允许我们只做西方人类学的阐释者或跟踪者,当然也不能做唯唯诺诺的“政治花瓶”。我们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坚持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执着信念,相信我们自身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能为中国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从而重视和发展应用人类学,主动承担起研究当代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问题的职责,直接为我国

党和政府的决策咨询服务,为中国人民从理论上释疑解惑,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添砖加瓦、鞠躬尽瘁。

二、人类学发展历史经验中的一个重要启迪

人类学重视研究现实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得到了一个重要启迪:这就是什么时候人类学开始关注、研究现实热点问题并注重为现实社会服务,什么时候人类学就会变得影响更大、位置更高、作用更大,同时人类学自身也将获得繁荣和发展。20世纪20年代,西方人类学盛行用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等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些学派缺乏为当时统治者统治殖民地民族所急需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对殖民主义者来说,缺乏实际应用价值。”^{[7] (P. 101)}与此相反,功能学派则开创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研究先河。此后,人类学家开始从书斋中走出来,纷纷投入到田野考察,通过参与式观察或实地观察法,依据实际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和研究成果,力图解决当时世界各地殖民地社会所面临的各種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人类学在当时被认为起到了为殖民统治“挽救危局的作用”^{[7] (P. 101)},因此受到以英国为代表的各国殖民主义统治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甚至要求被派往殖民地的所有军官必须到大学进行人类学课程补修。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人类学也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出现了许多研究机构、名人名著以及著名理论,功能学派即是其中之一。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后,影响较大的也是功能学派。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家认为,为应用人类学提供理论基础的功能学派理论,最适合用来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他主张人类学从研究原始民族扩大到研究现代民族,特别强调人类学为现实服务。其得意门生费孝通就是一个强调人类学应为“认识中国”、“改革中国”服务的著名学者,并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梁钊韬创建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培养一大批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各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总之,从吴文藻、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梁钊韬等我们所熟知的一辈中国人类学家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只有当人类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把本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时,你的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同样,人类

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为现实服务,只有在现实服务当中人类学才能走向繁荣和发展。

由此可见,为现实服务或为国家服务,不仅是国外人类学研究的传统之一,也是中国人类学研究 and 发展的成功经验。近十多年,我在出国讲学和考察中,明显感受到当代欧美人类学为现实服务的价值取向非常明显。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交通迅速发展、移民和人口流动加速,各种文化四向横流、交流频繁的新时代,文化不再仅仅是按地界、国界划分出来的独立系统,文化在都市化和市场化新社会中形成了一个斑驳的混合物。在各国加快对外开放,经济、社会全球化的浪潮中,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渐渐减少甚至消失,传统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难以完全适应急剧变革的新时代。这也是人类学出现发展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分支学科的重要原因。因为人们认为传统社会正在向现代过渡,如果此时我们依然把文化仅仅当作“残迹”“遗留”来研究,就会“变得先天不足,需要一种新行当,把文化和发展连在一起,于是产生了发展人类学。”^{[8] (P. 73-79)}发展人类学强调人类学在各种发展项目和计划中的决策咨询作用,从而使这些计划和发展项目更适应社会、更符合不同的民族文化,因此提倡“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可见,发展人类学家和应用人类学家在各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正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他们的发展思路更接近社会,更符合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因而更容易被各国政府和决策单位接受,从而在各种发展项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各国各地的发展少走很多弯路。因此应用人类学或发展人类学家在发展项目设计和实施中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欢迎。“1974年,世界银行这个经济学堡垒中只有一位人类学家,如今社会科学出身的职员已有60来人,每年还有数百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前来做短期顾问。”^{[8] (P. 73-79)}现在世界上其他各种各样从事发展项目的机构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近几年,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在中国的发展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让项目的直接受益者真正参与到项目之中并成为项目的主人。调查不再仅仅是为了收集材料,写几篇论文或著作,而是为了真实地了解项目地区各族人民对项目的真实看法、愿望和意见等。这些新的调查方法、目的、思想对人类学的传统研究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要求。实践表明,

中国人类学要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应用研究,离不开为现实服务。

三、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

加强中国人类学研究为现实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克曾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关系,他总结了马克思学术研究的几个突出特点。他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重视的是对未解放人民的研究;他的学术兼有政治、学术双重性质;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时期,他把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用莫里斯的话来说“马克思准备为被压迫人民重写一部人类史书,以便他们能够明白他们所受压迫的本质,以及这一压迫是怎样产生的。”^{[9] [P.9]}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学术研究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永恒,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还力图说明在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一个怎样的内在动力,这一动力怎样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繁荣及至最终灭亡。”^{[9] [P.9]}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当今世界反思资本主义的热点讨论。为什么被称为充满活力的美欧老牌资本主义面对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的危机显得无能为力、束手无策?而改革后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却能促进市场经济持续发展?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中国人类学者进一步思考和深入研究吗?

事实证明,世界上社会科学界没有一个学说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那样客观、准确、全面地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然历史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者大有人在,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更是如此,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依然是最具魅力、最具威力、最具影响的理论和思想。当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全球范围内举行过一次网上评选“千年思想家”的大型活动,结果得票高居榜首的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大家想一想,人类社会曾出现过千千万万的思想家,为什么到现在马克思仍然能够独占鳌头呢?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体系,是科学真理。不但用科学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为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且用科学的理论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更重要的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印证了马克思当初的预见^①。如果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民

主政治一直被视为是一对孪生体,那么当代国际正在发生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财政赤字危机、高失业率等等是否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和民主政治已经不能有效地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之所以这样说,其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认为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民主所产生的政权只是资产者资产的看门人。由此决定了“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金融资本,可能是个必然的趋势。这并非没有可能。”^[10]现实再次印证了马克思应用研究的科学预见,实践也再次证明中国人类学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四、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人类学研究为现实服务是我们国家的需要,也是党的需要,更是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是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以超自然为本的神学发展观,神的地位淹没了人的地位,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扭曲和黑暗。资本主义发展后又出现了以物为本或以金钱为本的发展观,商品拜物教大行其道,人的本质被再次扭曲、异化。正确的发展观或科学的发展观应该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观。无论是“三个代表”的思想,还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都体现了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科学发展观。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人的科学。当前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就应该为研究、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服务,为促进中国各族人民的全面发展献计献策。

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实际上与文艺一样,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过去,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为殖民统治服务是错误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求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需要解决两个问题:(1)中国是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在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旗帜。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类学研究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研究,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研究。(2)中国人类学研究必须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服务,为中国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文明、富

裕的多民族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家园而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服务。

当代中国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新形势要求我们从科学发展观出发,从国家利益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对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现象以及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做出科学的调查和论证,努力使中国人类学成为鼓舞中国各族人民、激励中国各族人民以及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精神武器。只有这样,中国的人类学才有正确的方向和辉煌的未来。

中国正在大步迈向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双重进步和繁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对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都将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中国改革开放和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对它们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深刻的危机和战略撤退的背景下,曾一段时期内许多学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景失去了信心,西方一些人类学家更是期待着社会主义制度从地球上消失。然而时隔不到20年,就连世界经济论坛主席也说“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世界”^②,因为资本主义制度面对世界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并获得巨大成功。同样实行市场经济,中国顶住了多次金融危机,并使经济一直快速发展。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可以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发展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实现与世界各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往来。一句话,现代化并非只姓“资”,也可以姓“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的现实,呼唤着中国人类学家走向田野、走向社会、

走进人民、走向世界;要求中国人类学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和理论,为促进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共同进步,为建设人类美好的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人类学大有可为,大有希望。

注释:

①参见[美]奥·巴尼奇《十足现代的马克思》,载于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5-6月号,参见《参考消息》2009年5月24日。

②参见《德国金融时报》2012年1月25日相关报道,题目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世界》,参见《参考消息》2012年1月26日第10版。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N].光明日报,2004-10-23.

[2]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1-10-19.

[3][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人类学的趋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转引自谢剑.理论与实践:当代应用人类学简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7]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8][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人类学与发展[A]//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人类学的趋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英]莫里斯·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M].冯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0]郑永年.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矛盾[N].联合报,2011-11-01.

收稿日期:2011-12-22 责任编辑 李克建